

从阐释学视界融合理论看《离骚》的复译

□ 冯斗 许玫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本文用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分析了中国著名典籍《楚辞》的代表作《离骚》的多个英译本。从视界融合历史性角度分析了《离骚》的不同译本对艺术作品内涵理解多元化的合理性, 并从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输出、加工和再创作角度探讨了视界的二度融合在复译中的作用。

[关键词] 视界融合; 历史性; 复译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1-0082-05

一、《楚辞》与《离骚》的英译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 中国历代《楚辞》学者对它的研究也绵延不绝。西汉刘向、东汉王逸、南宋洪兴祖、朱熹、清初王夫之、清代蒋驥、现当代学者郭沫若、闻一多、汤炳正等都围绕《楚辞》做了大量研究和注本。由于两千多年的语言文化变迁, 书中不少字句意义不明, 疑难比比皆是, 对很多细节都无法做到绝对客观的阐释。《离骚》堪称《楚辞》的代表作之一, 是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 该篇诗作长达375句、近2500字, 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虽然在《离骚》外译的历史中, 英译起步较晚, 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自从1879年派尔克在《中国评论杂志》发表了《离骚》英译文以来, 其各种英译本便层出不穷。从1895年至今, 众多中外学者如理雅各、林文庆、霍克思、许渊冲、孙大雨和杨献益、戴乃迭等都对《离骚》的翻译作了不同尝试。众多复译版本的陆续出现, 不同角度的翻译探索与尝试, 以及译本水平的逐步提高,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首古典诗歌的翻译难度。

《离骚》的翻译之难在于它既是典籍翻译又是诗歌翻译。首先, 典籍英译要求在研究字词的训诂方面要大量研究各家经典注本, 弄清文义。由于楚辞历史注本较多, 见解不一, 给翻译带来很大难度, 译者必须斟酌鉴别, 择优从之。此外还需对作者的

思想、生平, 作品的内容、时代背景, 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 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等做到心中有数。其次, 诗歌在文学翻译中是公认的最难的体裁, 其一是因为诗歌具有音意俱重的特点, 义可传而音难译, 诗之形式与内容不可剥离, 《离骚》独有的骚体的韵文体裁, 在翻译时更是受限于诗行、韵律、节奏等多方面的束缚, 对译者的文学底蕴和翻译技巧要求颇高。其二, 诗歌语言的“隐约微婉”, 诗歌作品自身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的多义性往往会导致理解中的分歧, 因此, 对诗歌的理解和诠释往往是多样化的, 既包含了作者的原意, 又包括了在历史的发展嬗变中不同阐释者所叠加的意义。

譬如对题眼“离骚”的释义历代学人就有很多争议, 英译本题目因此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版本。译本一“Encountering Sorrow”主要是依据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的解释。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 犹离忧也”。然而“离忧”者何谓也, 则未闻其详。班固在《离骚赞序》里进而释为:“离, 犹遭也, 骚, 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1]。译本二“Sorrow after departure”则是参照了东汉王逸的解释“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 别也; 骚, 愁也; 经, 径也; 言己放逐离别, 中心愁思, 犹依道径, 以风谏君也”^[2]。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译本三“Li Sao”, 用音译形式将这种文化词直接投射到异界文化空间, 充分传达原作的异国风味, 且引进源语的表达方式,

不失为一种译法。

二、视界的概念

视界的概念是源于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观”和迦达默尔的“偏见观”。在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理解,因此这种前结构必然打上自己的个性和存在的烙印,即形成所谓的“偏见”。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是进行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我们的偏见,偏见又构成了人的理解的特殊视界。“视界具有敞开运动的特点,因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如下事实,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是我们悠游其间又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它总是随着历史传统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3]。因而视界也具有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历史性反映在对象文本的视界上。语言所跨越的时间越长,其演进所造成的差异也就越大,这种差异体现在书写、词汇、意义以及文体各个方面,这在中国古典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这就造成文本本身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和空白点,它们需要译者的阅读加以具体化。其二,历史性体现在译者的当前视界上。作为阐释的主体,他也同样是历史的。不同译者因为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各异而不同程度地主宰了翻译过程,对权威注本的斟酌鉴别、个性化的理解及领悟内化也构成了译者的当前视界的历史性。其三,译文的读者期待视界也具有历史性。读者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参与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根据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和知识结构形成他们不同的“期待视界”。这种期待视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者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及翻译中的选择与重点。综上所述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视界的历史性自然就影响到了翻译的两个层面:一是理解,二是表达。在此本文从西方阐释学视界融合的角度探讨了离骚的多个译本。

三、视界融合

在翻译中,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初始视界),而对这文本进行理解解读的人则具有现今在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现今视界)。这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

情境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迦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的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任何视界都是流动生成的,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我视界的超越”^[3]。这表明艺术品是超越时代产生的,它在不同时代中被重新理解,并产生新的意义。

(一) 一度融合

现代阐释学将文本视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意味着意义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没有客观不变的意义。翻译面对的是原语文本,而文本是“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文本一旦摆脱了作者写作时此时此地的“当下性”,就产生了与读者的“疏离状态”或“间距”^[4],译者作为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始终是单面的,而他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文本引起的“双重蔽体”。作者远在天外,文本近在眼前,但都不能开口,只能凭译者运用慧心慧眼通过反复阅读参照来理解诠释文本意义。因此,任何人对文本的理解都是相对的,理解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且任何理解都只具有暂时性。在每一次的翻译理解中,视界的融合角度和程度都会有差异,从而决定理解必然有差异,理解的相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视界融合的历史性和有限性决定的。

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译文1(杨宪益、戴乃迭译)^[5]: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Though I my gifts enhanced and curbed my pride,
/At Morn they'd mock me, would at eve deride;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But since my heart did love such purity, / 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译文2(许渊冲译)^[6]: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oh! / I'm grieved
at a life full of woes.

Good and just, I hear only jeers, oh! / Morning
and night I suffer blows.

I make a belt of grass sweet, oh! / And add to it
clovers and thymes.

My heart tells me it's good and meet, oh! / I won't
regret to die nine times.

译文3 (大卫·霍克斯译)^[7]:

Heaving a long sigh, I brush away my tears, /
Grieving for man's life, so beset with hardships.

I have always loved pretty things to bind myself
about with, / And so mornings I plaited and evenings I
twined.

When I had finished twining my girdle of orchids,
/ I plucked some angelicas to add to its beauty.

It is this that my heart takes most delight in, / And
though I died nine times, I should not regret it.

在第一句中,译者对“民生”的理解有所不同,而翻译为“人生——man's life”还是“人民——my people”对下文的理解则起着重要作用。但从上下文以及“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兮”等多处互文参照看来,此处“民”还是应作“人”解,民生即是人生。第二句译文的分歧就更为明显。在当代的注本中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讲作者以马自喻,说自己虽然品行高洁,严于自修,但却因此在朝廷上失意。“朝谇夕替”指一群小人朝朝暮暮在排挤他,言政治腐败,受到佞臣的诬陷^[8]。而另一种解释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写离骚时,屈原已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楚怀王也已“怒而疏屈平”。“朝”、“夕”形容翻脸之速。“谇,让也”,有“劝告、谏诤”之义,“替”作“废弃、贬黜”解。于是又可理解为:“我爱好美好正直的品质,却让人感到碍手碍脚;早上进谏,晚上就被贬黜”^[9]。杨译和许译皆采纳的是前一种说法,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却与两种注本皆不符合,而是独树一帜,将“朝谇夕替”理解为诗人朝夕编织香花芳草自修,以香花芳草自诩,借以象征人格的高尚和芳洁。很多人认为这个译本是误译,然而这个译本其实是有据可考的。闻一多在《离骚解诂》中注释曰“鞿羈”,谓以芳草交络其身以为饰,如马之有缰络也^[10]。书中同时引用大量古籍旁证,认为“谇”同古字“讯”,表示“缚束”,意义与“鞿羈”相近。“替”通“绋”,为名词时指丝织物类名,作动词表约束,又与“鞿羈”义相通,而非废省之“替”。以披戴鲜花香草比喻自己重德修身的修辞手法在《离骚》中还有多处可见,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等大量比兴手法的运用,把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包蕴于丰富、鲜明和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将物的特质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是《离骚》文体的一大特点。可见,霍的译本是将所参考的注本视界、文本视界结合个人的当前视界进行了全新角度的融合。

就理解而言,由于时代的差异,原本文本中的语言或非语言的因素与译者的认知结构与语言能力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距离,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当然这种困难可以通过译者的努力减少,但是永远不可能消失。又由于对象文本视界和译者的当前视界的历史性,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可能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本。见仁见智都是对原著的理解,不能绝对地讲哪一种译法就背离了原著,因为谁也无法规定某种对文本的理解方式是唯一的,对艺术作品内涵意义的思考和挖掘更是多维度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译者的理解和传导的。

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至今仍局限在文本理解的范围,其实在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输出、加工和再创作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视界融合的问题。

(二) 二度融合

译者的“前理解”和“偏见”实际上意味着解释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行为。译者从自身“偏见”出发,对翻译译文视界进行一定个性化的调整,取舍,例如对细节作出创造性的添加、改动、删节,以达到对原文效果的对等甚至增值,这必然要求译者将自身视界和译本、读者的视界进行新一轮融合,即视界的“二度融合”。

例: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
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一段是诗人描述一路车马喧腾,遨游太空,即将远离故国之际,忽然间俯视到自己的故土,顿时间仆悲马怀,再不肯前行。仆夫和马尚眷恋如此,诗人之心之情,殆可得知,去国远游之行,在此戛然而止,有力地表现了诗人的内心冲突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热情。

译文1 (杨宪益、戴乃迭译)^[5]:

Ascending where celestial heaven blazed,
On native earth for the last time we gazed;
My slaves were sad, my steeds all neighed in grief,
And gazing back, the earth they would not leave.

译文2 (许渊冲译)^[6]:

I rise to see the splendid sky, oh!

I bow to find my home below.

My horse neigh and my groom sigh, oh!

Looking back, they won't forward go.

译文3 (大卫·霍克斯译)^[7]:

But when I have ascended the splendor of the heavens,

I suddenly caught a glimpse below of my old home.

The groom's heart was heavy and the horses for longing

Arched their heads back and refused to go on.

以上三个译本为例,可看出对同一场景的意象和人物情态的刻画各个不一,风格迥异。先看“忽临睨乎旧乡”一句,三个译本的翻译就各有千秋。在这一句的翻译上霍译最贴近原文。杨译将“忽”改译为last time,表现了人物对故乡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整体伤感的氛围相呼应。许译“bow”是为了与译文前半句“rise”相呼应,让诗句更具对称之美。尽管后两种译文没有忠实原文,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第二句的处理上,许译将马对故土的思念(马怀)和仆人的悲伤(仆悲)转化为neigh和sigh两个词,表达的是一种听觉意象,这个细节是增添的,尽管未完全做到忠实,但在诗节表达的情感效果上仍然达到了对等。霍译省略了“顾”字的翻译,而保留了原诗“蜷局”这个视觉效果,即“Arched their heads back”,同时“arch”这个动词在译文中增添了动觉意象的效果,表现了人和马的动作情态,弥补了减译“顾”的不足,也突出了诗节画面的立体感以及使其意像更加鲜明的视觉感。

视界的“二度融合”在复译层面上也常表现为表明某种再创作的动机,迎合时代的需要以及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无论什么样的译本,它都有一个语言与观念上“现实化”的问题,与大多数创作一样,它必然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形变。综观以上几种译本,可以看出其在风格上不拘一格,各有所长。

许渊冲译文一大亮点就是将“兮”译为“oh”,是试图模仿并保留原诗的音韵美与节奏美。语助词“兮”字在诗中大量而广泛地运用,它既起着表情的作用,又有调整节奏的作用。《离骚》的句式一般是两句为一小节,构成上下对称的长句,“Oh”不仅在译文中起到了句逗、押韵的作用,同时对表现诗人因抱负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激昂、悲壮、迷惘等种种复杂的心情也是很好的诠释,堪

称《离骚》英译译本中的一大独创。著名学者杨成虎曾评价道:“许的译文着力表现骚体的特征,在选词造句上宁美不信,仍存在很多臆造和不达意之处”^[1]。如将“帝高阳”译为High Sunny King,又将“伯庸”略去不译,而将“摄提”译为自创的Wooden Star。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词尽管只言片语,但却字字珠玑,经历了历史文化沉淀,言简意赅。许译过多地忽略了原文本中词语的文化信息,是译本一大缺憾。霍译采取的是音译并加解释的办法,主要是从英语国家读者的角度出发,本着开展外国文学引进交流的目的而侧重于对文化词汇的诠释和意象的翻译。这一译本采取了逐字逐句与自由翻译之间的中间道路。为了精确地传达意义,他甚至不惜为了意义而牺牲诗句的韵律。全译本还采用两种注释方式:脚注和尾注。脚注简单扼要,尾注极详,颇有学术价值。如《离骚》“荃不揆余之中情兮”一句里的“荃”,霍克思译为the Fragrant One(芳馨神君)。尾注对此解释说,这里所用的中文词‘荃’是一种花名……在这一段上下文里,它通常用来比喻诗人的国王,按照大多数注释家的看法,也即楚怀王。霍克思还对“摄提”、“女媭”、“灵修”、“椒兰”等专名作出了相当全面的解释与说明。霍克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疑有助于英国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离骚》的内容与特点。与霍译相比,中国的读者群更偏爱杨译。杨译颇得益于英国18世纪诗歌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受Dryden和Pope的诗的影响。他感到屈原的《离骚》和英国18世纪的这种英雄偶句体诗的形式有相像之处,于是他就模仿Dryden和Pope的风格一口气把《离骚》翻译出来了。杨译在选词造句上下了功夫,注重了译本的文学性。模仿原作的古雅之风,翻译时用的英语也尽量“古雅化”。译者还用到thou, thy, thee, ere (before)等英语旧体词,其目的在于贴近中国古典诗的形式,获得一种古雅的表达效果。由于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受限于诗行、押韵等方面的束缚,翻译中译者用到了大量的倒装结构。霍克思教授对其这样评价到:“像蒲伯译荷马史诗那样富有诗感,虽然并不忠实于原文”。

综上所述,每一个译本虽然都有其亮点,但是缺憾也无法避免。“就一个具体译者而言,当他翻译一个文本时,他的视域和各种能力时刻受到种种限制,一个翻译文本的完成,在其文字凝固的一瞬间,也同时铸下了种种遗憾”^[4]。一个译本的缺憾可能正是另一个新译本的突破点。后来的译本不一定要有超越前人译本的压力,但须从弥补前人的不足点

出发,有所创新,发挥所长,尽显风流。《离骚》的几种复译本都是以原文本为运动的起点,围绕原文本向不同的方向作阐释运动,期望“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有侧重音韵的译本,有侧重内容诠释的译本,有关风格风格的译本。不同的译本肩负不同的使命,忠实与否已经不是评判译本唯一的标准,能否使译本完成新的使命才是复译的压力所在,也是判断复译本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视界融合是理解者视界和理解的对象文本视界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结果。考察文本的所有历史视界和理解者当前视界的正当性,是确定所有理解和解释有效性的必由之路。仔细研究多个权威注释本,斟酌鉴别,择优从之,让更多的历史视界内化于心,是典籍翻译的必由之路。当然在选择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加进自身视界的判断和领悟,文本的理解和复译正是在文本的权威的“历史视界”和译者的“现今视界”的融合中产生的。艺术作品本真意义的揭示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是依赖于理解者的理解传导的。在作品的意义寻求中强调理解者与作品的视界融合,正是把不同译者的理解和体验看成是对艺术作品本真意义的多元化的阐释和演绎。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三家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董运庭. 楚辞与屈原再考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 王岳川.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 山东: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4]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5] 杨宪益, 戴乃迭. 楚辞[M]. 北京: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 [6] 许渊冲. 楚辞[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4.
- [7] DAVID H,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ll, 1959.
- [8] 马茂元. 楚辞注释[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9] 聂石樵. 楚辞新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闻一多. 离骚解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1] 杨成虎. 典籍的翻译与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 2004, 17(4): 57.

Hermeneutic Fusion of Horizon and Retranslation of Li Sao

FENG Dou XU Mei

(Univ. of Elec. Sci. & Tech.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c fusion of horizon, this paper does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mong multipl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Li Sao,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poem of Chinese classic anthology — Chu Ci. From effective histor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idity of hermeneutic diversity in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translation. By emphasizing on translator's "prejudice" and creativity, this paper does not limit its discussion of "fusion of horizon" in the range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but extends further into a new dimension — the target language output process.

Key words fusion of horizon; historicity; retranslation

编辑 戴鲜宁